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学术简史 / 李开, 刘冠才主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305-04091-6

I. 晚... II. ①李...②刘... III. 学术思想—思想史—中国—清后期 IV. B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9268 号

书 名 晚清学术简史
主 编 李 开 刘冠才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 话 025-3596923 025-3592317 传真 025-3686347
网 址 <http://www.njupress.com>
电子信箱 nupress1@public1.ptt.js.cn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丹阳市教育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9.5 字数 328 千
版 次 2003 年 10 月第 1 版 200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ISBN 7-305-04091-6/K·277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编 鸦片战争前后的启蒙学术及其负面学说	(1)
第一章 龚自珍古文经渊源、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历史发展哲学思想	(1)
一、龚自珍与古文经学	(1)
(一)受外祖父段玉裁和父亲龚丽正的影响	(2)
(二)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相互发明	(4)
(三)兼采汉、宋的经学史观点	(5)
二、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思想	(6)
(一)师承刘逢禄之前,发挥《公羊》“三世”说	(6)
(二)师承刘逢禄之后,发挥《公羊》和《尚书·洪范》历史进化说	(9)
(三)经、史结合,阐发《春秋》大义三律	(11)
三、龚自珍的哲学思想	(14)
(一)历史发展观和历史发展循环论	(15)
(二)世界为心力所造的唯心宇宙观	(15)
(三)“名副其实”的名实观	(17)
(四)无善无恶的人性论	(18)
(五)社会变革的历史哲学思想	(20)
第二章 魏源的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启蒙哲学思想	(24)
一、魏源的今文经学思想	(24)
(一)对乾嘉学派的批评种种	(25)
(二)以“经术为治术”的批评标准	(28)
(三)《书古微》要义	(30)
(四)《诗古微》要义	(32)
二、魏源的启蒙哲学思想	(35)

(一)朴素的辩证法与进化的历史观	(35)
(二)以民为本的思想	(37)
(三)以天为本的世界观和注重实践的认识论方法	(38)
第三章 曾国藩与其他封建卫道者的保守思想	(43)
一、封建卫道士的思想历程	(43)
(一)封建卫道士的“一宗宋儒”	(43)
(二)封建卫道士的“汉宋兼容”	(46)
二、心学之实学与哲学上的倒退	(47)
(一)宇宙观上的唯心主义天命观	(48)
(二)认识论上的“格物诚意”论	(48)
三、邵懿辰、戴望的今文经学思想	(49)
(一)今文经学者邵懿辰和他的《仪宋堂记》	(49)
(二)今文经学者戴望和他的代表作《论语注》	(51)
第二编 从传统守旧到务实求变之新学转变中的学术思想	(53)
第四章 左宗棠的程朱理学和经世致用思想	(53)
一、西学东渐背景下的旧学名儒	(54)
(一)“恪以程朱为宗”在理气论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54)
(二)对程朱理欲观“存天理 灭人欲”的继承	(55)
(三)“性受命于天”和“性不外道”说	(56)
二、“义利之辨”与存心报国	(57)
(一)从孔子“义利统一”到朱熹“义利对立”到左氏“义利统一”	(57)
(二)忧国忧民与个人修养“须用敬”	(59)
三、“穷经将以致用”与继承龚、魏的实学精神	(59)
(一)从开读《论语》到继承龚、魏	(60)
(二)读经求知和面向社会的方方面面	(60)
四、“中不如西 学西可也”的文化主张	(62)
(一)学习西方文化的认识深化过程	(63)
(二)对“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认识	(63)
第五章 郭嵩焘调和汉宋、经史兼治 探求西儒、中西会通之路	(66)
一、时代发展和学术大势	(66)
(一)有多种建树的近代名儒	(66)

(二)“调和汉宋”学术大势下的学术主旨	(68)
(三)训诂考订的丰硕成果	(69)
(四)史地研究的求实之路	(70)
(五)“立身制行”的治经目的	(72)
二、通经致用和对外开放说	(73)
(一)通经史以治身心	(73)
(二)通经史以为政	(74)
(三)引经史论证对外开放	(75)
三、对宋儒的批评	(77)
(一)宋儒不善于由文以通志	(77)
(二)宋儒有支解、割裂经文之嫌	(77)
四、中西哲学对比研究的尝试	(78)
(一)平视诸家哲学,寻觅中西相通之理	(78)
(二)“以议论相胜”的虚骄之气与中学务实、西学求证不相容	(81)
(三)极深究“几”、明乎“理势”为成就功业之路的哲学反思	(84)
第六章 刘坤一从守旧卫道走向开明务实	(90)
一、刘坤一生平的五个阶段	(90)
二、刘坤一思想的保守时期和开明务实时期	(91)
第七章 皮锡瑞平实致用、倚重学术的今文经学	(94)
一、科场失意和转治儒经	(94)
二、政治改良中的渐变论	(96)
三、兴学育才和使经学返归平实致用	(98)
第八章 廖平“经学六变”与旧经学的终结	(101)
一、孤学蒙擢和“经学六变”	(101)
(一)“重思”之学习方法和与众不同的才华	(101)
(二)廖平的“经学六变”	(102)
二、打破古今界限的“小大之学”和“经学六变”中的进步与倒退	(106)
第九章 孙诒让疏证和绌绎《周礼》为变法维新寻找理念证据	(108)
一、古文经家学渊源和集朴学大成的《周礼正义》	(108)
(一)《墨子间诂》胜义纷纷,《周礼正义》古学丰碑	(108)
(二)《周礼》学之冠	(109)

二、寓变法理想的《周礼政要》	(110)
(一)扼腕时局和变法的复古主旨	(110)
(二)《周礼政要》的维新方案及其思维定势	(111)
第三编 以发展早期资本主义和“中体西用”为重心的经世致用之学	(113)
第十章 洪仁玕的儒学传统和近代早期谋求资本主义的思想	(113)
一、一位有近代新思想的知识分子	(113)
二、忠君爱国的新内容和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方略	(114)
(一)儒家传统的忠君爱国思想	(114)
(二)近代化思想和基督教神学唯心主义	(115)
第十一章 李鸿章及其幕僚同好们的洋务思想与洋务实践	(117)
一、李鸿章“一路扶摇”的政治生涯和受制于“诚”的洋务主张	(117)
(一)处世治学深受曾国藩的影响	(118)
(二)以“诚”和戎的外交思想	(120)
(三)以培养新式人材为核心的内政改革	(121)
二、李鸿章幕僚同好们的洋务思想和实践	(123)
(一)冯桂芬和他的“中体西用”说	(123)
(二)薛福成和他的“君民共主”说	(125)
(三)郑观应和他的商战思想	(128)
(四)马建忠和他的富民说以及旨在强国的语法学	(132)
(五)容闳和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136)
(六)王韬和他的新式教育构想	(137)
第十二章 张之洞从政、治学、综合汉宋和立足古文经学的中体西用	(145)
一、为古文经学力挽狂澜	(145)
(一)崇尚古文经学,力辟今文经学	(146)
(二)为考据学张大军势和兼采汉宋的现实选择	(147)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观	(151)
(一)体用关系和“中体西用”说	(151)
(二)“中体西用”说的哲学基础及其“开新”和“卫道”的统一	(152)
(三)“中体”卫道之说	(153)

(四)“西用”开新的不断丰富	(155)
三、“经世”与“务实”之学	(157)
(一)“经世”传统和内圣、外王	(157)
(二)“易简”、“切用”之策九则	(158)
第十三章 黄遵宪变法图强以走向世界,开发民智以学习西方的学术思想	(161)
一、不走传统的为官、治学之路	(161)
(一)请纓出洋,以明治维新为借鉴构筑变法图强的思路	(161)
(二)“万国强由变法通”	(162)
(三)向西方学什么?	(163)
二、开发民智方能学习西方	(165)
(一)办社会教育的目的是开发民智	(165)
(二)围绕学校教育的新教育观	(166)
(三)协办《时务报》,传播新思想	(167)
(四)以诗歌名家和“我手写吾口”的文学创作主张	(168)
第十四章 曾纪泽长期结合外交生涯的经世致用	(171)
一、经世之学和西学的结合	(171)
(一)中西合璧的社会文化思想	(172)
(二)生活在西方世界中的两种文化的碰撞和融合	(174)
二、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	(176)
(一)执节不屈,据理力争	(176)
(二)备战促和,以战止战	(176)
(三)审时度势,以夷制夷	(177)
(四)培养优秀外交人才	(179)
第四编 维新改良派的学术思想	(180)
第十五章 严复以摄取进化论而自强保种名家	(180)
一、吸纳西方哲学以求经世致用	(182)
(一)物竞天择,自强保种	(182)
(二)在中西学术对比中阐述“维新”思想	(183)
二、开启民智,教育救国	(184)
(一)进化和进步离不开开启民智	(184)
(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在于求实、综合和试验	(186)

三、对中西文化的重估	(187)
(一)尊孔读经 利国善群	(187)
(二)晚年对传统的“回归”及其意义	(188)
第十六章 康有为的经学嬗变、抉发微言和哲学观种种	(192)
一、丰富多彩的生活经历	(192)
(一)国学基础和西学新知	(192)
(二)七次上清帝书和办学、办报作维新变法准备	(193)
(三)维新变法的设计师	(194)
(四)流亡海外和时代的落伍者	(194)
二、康有为的经学思想	(195)
(一)从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的转变	(195)
(二)《新学伪经考》的内容及其价值	(198)
(三)《孔子改制考》重塑孔子为改革家和以复古为思想武库	(200)
三、其他经学著作的内容和价值	(204)
(一)《春秋董氏学》发挥董仲舒“三统”循环说助证托古改制	(205)
(二)《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为抉发孔子“圣之时者”	(206)
(三)《中庸论》阐说孔子《中庸》微言以使“孔子之大道复明”	(207)
(四)《论语注》言《论语》为孔门弟子学说仍为孔子儒学宗守	(208)
(五)《大学注》说《大学》最为孔子“内圣外王”	(209)
(六)《孟子微》言《孟子》为求解孔子“平世大同之义”的必由之路	(210)
四、康有为的哲学思想	(211)
(一)康有为的自然哲学观	(211)
(二)康有为的社会哲学观	(216)
(三)“以仁为本”的博爱哲学观	(219)
(四)“世界大同”的哲学观内容种种	(222)
第十七章 谭嗣同以“以太”为始元构成的机械唯物论和反封建思想	(225)
一、唯物论的“泛仁论”哲学思想	(226)
(一)“以太”仁之本 道必依于器	(226)

(二)以“以太”为本体的宇宙观,“仁”即“以太”说	(227)
二、谭嗣同反封建的社会政治思想	(231)
(一)抨击名教,冲决罗网	(231)
(二)“君末民本”说	(233)
三、谭嗣同的经济思想	(234)
(一)土地制度的改革 行井田之法	(234)
(二)“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	(234)
第十八章 梁启超的经学演进之路和自强进取哲学	(236)
一、梁启超早年今文 晚年古文 并中西结合的治经方法的演进	(236)
(一)论《春秋》为明义之书	(236)
(二)论《孟子》之言为孔子之言,所言为《春秋》大同之义	(238)
(三)《清代学术概论》力倡“保教非尊孔”论	(239)
(四)两种书目中《论语》《孟子》的首要地位及中国“思想之总根源”评价	(239)
(五)书目中论记载孔子的其他典籍	(242)
(六)书目从今文经学论《左传》不传《春秋》	(243)
(七)书目论《诗经》为“古籍中最纯粹可信之书”	(244)
(八)书目中的礼论,《尔雅》亦礼学一端说	(245)
二、梁启超援佛入儒的进取哲学思想	(246)
(一)心、物、环境三元宇宙观	(246)
(二)认识论中的运动说	(247)
(三)儒佛结合的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	(247)
(四)对佛教的革命性改造	(248)
三、梁启超重要学术著作评介	(248)
(一)两种书目旨在指示学术门径和夯实学术根基	(248)
(二)辨伪求真之作《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249)
(三)《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先秦政治思想史》	(250)
(四)《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252)
第五编 革新革命派学术思想	(254)
第十九章 孙中山光辉征程中的思想演进和综合进步哲学	(254)
一、光辉征程和思想演进	(254)

(一)从改良走向革命	(254)
(二)愈挫愈勇的革命斗士	(256)
(三)与时俱进的革命伟人	(259)
二、孙中山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知行观和民生史观的综合进步哲学	(260)
(一)以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260)
(二)重视革命理论作用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264)
(三)民生史观	(266)
第二十章 章炳麟的批评专制主义的经学和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思辨哲学	(270)
一、汇通经史子集 批判旧经学中的封建文化专制主义	(271)
(一)学成于诂经精舍	(271)
(二)早年考订《左传》古文经	(273)
(三)论“六经”编纂过程及孔子为史学家	(274)
(四)章炳麟与康有为异同论	(275)
二、章氏学奠基之作《馗书》的哲学思想	(278)
(一)《馗书》要旨	(279)
(二)《馗书》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280)
(三)《馗书》的物种起源保存说和人类进化论	(281)
(四)《馗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82)
三、庞大而个性鲜明的哲学体系	(284)
(一)以佛教唯识法相为主的唯心主义哲学	(284)
(二)以幻觉世界取代客观世界的唯心主义宇宙观	(285)
(三)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	(286)
(四)主观唯心主义认识论	(288)
(五)进化论历史观	(288)

前 言

两年前,我们申报了南京大学“985”第一批教材建设项目,旨在对晚清学术史作一番梳理,为中外学生提供一册简明的读本。令我们感到欣喜的是,不少来华留学生也对中国近代史时期的学术饶有兴趣。这是当初申请该项目的直接动因。

中国的繁荣富强是积弱、屈辱、落后、挨打时期的一批先哲们梦寐以求的愿望。晚清历史上,无数志士仁人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龚自珍(1792-1841)生活的年代,美国正是总统华盛顿(1732-1799)执政时期(1789-1797任总统),法国刚刚经历了百科全书派的思想启蒙运动,一批精神领袖,如狄德罗(1713-1784)、卢梭(1712-1778)等,都还谢世不久。西方的现代和前现代的界碑,学术界公认在14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1840年前后,西方的现代化进入以武力扩张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梦呓时代,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是其直接的受害者。封建和资本,皇权和民主,是不可调和的,那时,西方现代化的推进既然以吞噬中国为目标,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知识界,话语之丰富复杂,自然也是空前的。或卫护皇权,或逶迤周旋于皇权与资本之间,或思改良而欲与资本狼共舞,或务实求变谋求自身民族资本的发展。平心而论,那时并没有形成话语霸权,有着资本威慑力的外来文化在三千年文明的传统文化面前,只会被消解和融合,而产生新的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或保守,或动摇,或维新,或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晚清绚丽多姿的文化,各有优势,各显神通,并无一尊,庶几处于积弱时期的言论错杂的时代。不过,学术史告诉我们,学术自身的成就,常常并不因为国家的积弱而逊色,这正是社会经济与学术发展之间的不平衡规律在起作用。唯此,满目疮痍的晚清,学术文化大放异彩之处甚多。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早期/中期殖民时代的晚清学术,是现代学术、后现代学术的先声,是世界现代化学术中的一支最强音,在我们看来,与文艺复兴、百科全书派可共居大伽蓝,永远令人景仰。

晚清学术,还处于旧经学的时代,距离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经学时代

还很遥远,马克思主义以客观存在的外部世界为本体,西方理性主义,例如康德(1724-1804),则以“思想体”(noumenon/noumena)为本体。这要追溯到文艺复兴以人本主义代替神本主义的理性思维维度,追溯到笛卡儿(1596-1650)的“我思故我在”,即“人是主体”的哲学命题。海德格尔(1889-1976)则毕生探究“存在”,并通过人的生存状态揭示“存在”的价值,赋予人生基本结构以本体论意义。他把笛卡儿命题看作现代哲学的开端。他说:“在新时代哲学开始之时,有笛卡儿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对事物和全体存在者的一切意识,都被归结到人的主体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是一切信念不可动摇的基础。在后来,现实物的现实性被规定为客体性,被规定为通过主体并为了主体而被理解的东西。”从笛卡儿到康德,到海德格尔的主体本体论,是现代西方文化的灵魂(参见王晓华《现代化的限度与后现代化之路》2002),也是西方现代性的逻辑骨架。晚清学人,禀承传统学术,讲求经国济世的“经济”之学,“六经”载道不言“真”,但正如魏源所说,“六经”尽圣人忧患之书。以“六经”教黎民,忧患是主体对客体观照和反思的结果,它有观念的属性。伴随火与剑而来的西方主体本体论,在以主体道德观念为本体的儒学那里找到寄生之所,是毫不奇怪的,当然,传统儒学道德观念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实践理性。从龚自珍到章炳麟,融贯中西,含英咀华,西方主体本体论的本土化,是晚清现代性学术较之古代学术得以升华的缘由。这难道不是我们打开晚清学术这座宝库的钥匙吗?朱维铮教授(1994)在《求索真文明 晚清学术史论》中说:“我以为晚清的学术,的确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固然时时取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稗贩的西方古近学说。”正是这样,晚清的经世之学,蕴含着西学学理,跳动着西学主体本体论的现代性脉搏。

全书共二十章,其中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六章、第十八章、第二十章为刘冠才同志撰写,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第十九章为杨建忠同志撰写,第九章、第十三章、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七章为宋洪民同志撰写。三位同志均治国学,除擅长于考据外,于义理、词章、经济之学皆有悟性和修养。冠才曾主编辽宁省教委社科重点项目《诸子百家大辞典》问世,义理不废,由来已久,今于本书中瞰其高明,何须拙赞一字。叹刘、杨、宋“三生”有幸,全凭“学术渗透”、“学科互补”、“主修辅修”之力而成就之。

责任编辑金鑫荣先生项目刚成立就与我们取得联系,自始至终关心我们的项目,谨表诚挚谢意。

中文系主管教学的系主任徐兴无教授和孙立尧老师,关心督办,促成其事,谨此深谢一过。

学术史的研究,前有烈业,于今尚稀。全书书稿,我从头至尾校读过三遍,如有铸错,则完全由我负责。

本书责任人:李 开

2003年3月23日

第一编 鸦片战争前后的启蒙学术及其负面学说

第一章 龚自珍的古文经渊源、今文经学术思想和历史发展哲学思想

龚自珍,乳名阿珍,初名自暹,后名自珍,始字爱吾,又字尔玉,改字璈人,号定庵,又作定庵道人,又更名巩祚,再更名易简,字伯定,别号碧天怨史,曼倩后身。晚年自号羽琇山民,学佛时号怀归子,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生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卒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即鸦片战争爆发的后一年,终年五十岁。

龚自珍是清代经学思想演变过程中一位很关键的人物。一方面,他对公羊学说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在他手里,公羊学说才成为批判专制、倡导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开了晚清“喜以经学作政论”的先河,这一思想对后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有着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古文经学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并且提倡破除旧学术中盛行已久的壁垒森严、势若水火的门户之见。在他身上,标志着清代学术中汉学、宋学这两个营垒由原先的尖锐对立到逐步走向调和统一。

龚自珍虽然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但他对一些哲学问题,如名实关系问题、人性问题和历史发展规律的问题等,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龚自珍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为补救时弊,挽救行将崩溃的清王朝努力探索方法。

一、龚自珍与古文经学

龚自珍是今文经学的健将,但他对古文经学并不一意排斥,而是能择其

善者吸收之,这与纯粹的今文经学家庄存与、刘逢禄、宋翔凤等人不同,也与起初尊信古文经学,后来信从今文经学而大肆攻击古文经学的康有为有所不同。与古文经学紧密相关的乾嘉考据之学,对龚自珍也有深刻的影响,是龚自珍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

(一)受外祖父段玉裁和父亲龚丽正的影响

龚自珍对古文经学有颇深的造诣。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所撰《说文解字注》,被王念孙称为“盖千七百年来无此作矣”的文字训诂学的名著,所撰《六书音均表》,被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誉为古音学史上“凿破混沌”之作,当代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也认为段玉裁在《说文》研究中应坐第一把交椅,而在研究古音方面,应该“功居第一”。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是段玉裁的入室弟子,并且“能传其学”,著有《国语韦昭注疏》、《三礼图考》、《两汉书质疑》、《楚辞名物考》等。龚自珍自小受父亲与外祖父的影响,对于六经及古文字学方面都有深厚的素养。他曾有志写定六经,同时代的学者李锐、陈奂、江藩等人也都希望他做成此事。在道光初年,他曾致书在翰林院供职的某公,替他拟出了可向朝廷奏请的开石经馆,以整理、写定儒家经典的建议,首先提出了“改伪经”的主张。他认为“东晋《伪尚书》,宜逐削之,其妄析三篇,宜遂复并之”。他还要求改正因书体屡变和刻本纷杂造成的讹夺错误,并改正“唐、宋君臣,往往妄改”,“宋、元浅学,尤多恣改”的错误,但他强调那些属于经师异字、今古异字、假借字以及疑为错误而尚无可靠佐证者,则不改,要慎重对待。(《与人笺》,又题《拟厘正五事书》)

龚自珍是在视名物训诂为学问全部的社会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的外祖父段玉裁,他的父亲龚丽正对他的影响主要在正统考据学的小学训诂、经学格物方面。1799年,年仅八岁的龚自珍就开始读《登科录》,辑录二百年科名掌故。收集资料,正是考据学派治学的初步。从十二岁起,龚自珍就跟随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学习《许氏说文部目》,开始“以经说字,以字说经”,即以文字学引申经义,又以经义丰富文字学内涵。从此,关于古代典章制度、名物训诂之学,无论古今官制、版本目录学、历史学、地理学、金石学等,龚自珍均有涉猎,而且终生不废。考据学对龚自珍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龚自珍继承了明末清初民主主义思潮,并根据身处的现实,加以扩充,予以宣传,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基础之一。考据学派以诠释儒家经典为己任,在诠释、引申之中,往往强调原始儒学的务实性和民主性,并结合时代的特点,提出一系列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想要求。宋明理学把本来已被汉儒歪曲的“三纲五常”这个道德伦理规范神化了,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准则抽离成先天的不依存于人类社会的永恒规

范。这是历来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考据学者所反对的,龚自珍也勇敢地参与到这个行列中来。很显然,努力探求原始儒学的务实性与民主性,是龚自珍继承了先辈考据学派对先进思想追求的传统,他们的理论探索和宣传呼吁,不仅剥下了宋明理学各种严肃玄虚言论的外衣,还或多或少地起了动摇封建宗法制度思想基础之一的神学目的论的作用,体现了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倾向。其次,考据学派所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直接影响了龚自珍一代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龚自珍把这种经世致用的务实之学称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龚自珍在经世务实之学方面有很多建树,确实下了一番功夫。如他于地理学,曾撰述西北边疆的历史地理沿革,提出了建设边疆,巩固边防的方略,他精通蒙古语,研究蒙语文字源流,注意中华民族团结问题,他关心金融历史和现实的变革,提出经济改革的设想,他探讨政事程序,要求改革行政官僚的运作机制,他反对鸦片贸易,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等等。总之,他的论文大多数是涉及现实政治、经济、国防、行政、历史、地理等,甚至正式提出施行的建议,这与他受了考据学“经世致用”学术主张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再其次,考据学派研究问题的治学方法对龚自珍的治学、论述均有一定影响。考据学的治学方法主要是归纳法,是通过大量归纳排比材料,逐层推进,得其条贯,使结论清晰鲜明。龚自珍的主要政论,如《西域置行省议》、《北路安插议》、《保甲正名》、《地丁正名》,以及《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等一系列论文,内容切近社会现实问题,论述的方法仍以条贯的归纳、逐层的推进为主,使文气畅达,结论鲜明。考据学所用的这种归纳方法,既是一种治学的方法,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法。龚自珍的文章由点及面的广阔视野,宏观与微观有机地结合,与这种思维方法的训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龚自珍在晚年回顾外祖父段玉裁对少年的他予以考据学派治学方法的训练时,以深厚的感情吟道:“张杜西京说外家,斯文吾述段金沙。导河积石归东海,一字源流奠万哗。”龚自珍一直为自己是考据派的传人而自豪,并且晚年在《己亥杂诗》中还以自己未能在朴学(考据学)方面有所成就作为教训来教育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莫抛心力贸才名”,能继承考据学派传统,在这方面做出成绩。他在诗中写道:

俭腹高谈我用忧,肯肩朴学胜封侯。
五经烂熟家常饭,莫似而翁啜九流。

图籍移从肺腑家,而翁本学段金沙,
丹黄字字皆珍重,为裹青毡载一车。

尽管龚自珍对传统的考据学及古文经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在这方面也有一些著述,但他本人并没有把大量精力放在考据学术活动方面,因为他所面临的时代形势为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社会任务,他把自己的治学定位在社会改革宣传的活动上。正如他在《古史钩沉论三》中回答师友所说的“予大惧后世益不见《易》、《书》、《诗》、《春秋》。李锐、陈奂、江藩,友朋之贤者也,皆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方读百家,未暇也。内阁先正姚先生语自珍曰:曷不写定《易》、《书》、《诗》、《春秋》?又有事天地南北之学,未暇也”。很显然,以考据学派严格的科学精神和方法,去整理、诠释古代儒家经典,是龚自珍的意愿,但是,他认为,广泛地吸取各种思想流派的养分,从而撰述切合时务的政论文字,是他更为迫切的工作,至于考据学派传统的学术活动,只能俟之来日了。这也正是龚自珍与传统考据学派的区别之一,显示这位启蒙思想家在时代氛围之中,关注的重点是现实问题。

(二)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相互发明

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学说,龚自珍不仅对章学诚的观点大加赞同,而且撰写了《古史钩沉论》、《尊史》、《六经正名》等一系列论文反复加以阐发章学诚的观点。在《古史钩沉论》中,龚自珍的核心论点是认为古代一切文字记载都是历史资料,并且提出了“六经,周史之大宗”的著名命题。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国存,史亡而国亡。……六经者,国史之宗子也。《易》也者,卜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者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龚自珍的这段论述,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正好互相发明,他们把儒家的经典从被理学家推崇为神学教义的地位拉回到人类社会历史文献的行列,还这些儒家经典更切实可信的本来面目。当时的风气,经书是被当作偶像受到崇拜的,而史书只能居于次要的地位,就是所谓“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治史则道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的命题和龚自珍“六经者,国史之宗子也”的命题,抹去了经书的神圣灵光,同时也提高了史学的地位,这是符合近代学术发展的大趋势的。把所有的学术都放在历史考察范围之内,这就包含了冲破封建教条的积极意义。他们的议论都是针对时弊而发的,这与他们强调学术必须为“经世”服务的主张是分不开的。他们的学术观点,向人们透露出晚清经学嬗变的信息。

在对待具体的古文经书的态度上,龚自珍也与其他今文经学家如刘逢禄等人是不一样的。刘逢禄认为《左传》经过了刘歆之徒增饰、附会。在刘

逢禄看来,《左传》是不传《春秋》的。他说:“左氏以良史之材,博闻多识,本未尝求附于《春秋》之义,后人增设条例,推衍事迹,强以为传《春秋》,冀以夺《公羊》博士之师法,名为尊之,实则诬之。”他主张对于《左传》应该“审其离合,辨其真伪”,“以《春秋》归之《春秋》,《左氏》归之《左氏》,而删其书法凡例及论断之谬于大义,孤章断句之依附经文者,以存《左氏》之本真”(《释内事例》)。刘逢禄又作《左氏春秋考证》二卷,对《春秋左传》进行辨伪考证。全书分两部分,上卷共119条,摘引《左传》原文,证明是刘歆所比附而非《左传》旧有;下卷24条,摘引《史记》、《汉书》、《后汉书》、《说文解字》、刘向《别录》诸书和孔颖达的疏文,各证《左传》本不传《春秋》,均属刘歆所窜改而致伪。龚自珍认为《左传》是很有价值的书,纠正了刘逢禄偏颇之见,态度比较公允。在龚自珍看来,《左传》与《公羊》均可以配《春秋》(见《六经正名答问五》)。龚自珍并不故意贬低《左传》,说《左传》不足凭信。他对《左传》的批评仅限于很局部的问题,说“宜删去刘歆窜益”,即认为《左传》不足凭信的仅是某些内容。这与刘逢禄认为《左传》的文法、凡例、“君子曰”都出自刘歆伪造,《左传》本不传《春秋》的说法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后来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进而称刘歆窜改《左传》的目的是“所以翼王莽居摄而篡位者也”,则更是离题愈远了。相比之下,还是龚自珍的看法要客观、科学得多。龚自珍所撰《左氏决疣》,与刘逢禄的《左传春秋考证》、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比较起来,立论平和得多。至于《周礼》,龚自珍对它的批评更为严厉一些。他认为《周礼》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称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六经正名》)。龚自珍又说:“《周官》之称经,王莽所加,应该正名。”(《六经正名答问》)

(三)兼采汉、宋的经学史观点

在对待经学史上的汉学与宋学之争,龚自珍也表现出宏通、客观的态度。所谓“汉学”,即以古文经学为代表的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两汉以后历代皆有重考证,尚质朴之治学者,这些人都可视为汉学的传人,归为汉学学派之中。清代的汉学,则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考据之学,有人称之为新汉学。宋学,即以理学为代表的宋儒性命、义理之学。龚自珍力主屏弃“汉学”、“宋学”互相对峙、势不两立的门户之见,并且创造性地阐释古文经学中的资料,引出具有近代价值的新论点。

嘉庆二十七年(1817),年已五十六岁的江藩著成《国朝汉学师承记》,将书稿送与年仅二十五岁的龚自珍,请他读后作序。龚自珍坦率地建议应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他以宏通客观的观念来看待学术潮流演变